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2263

10位ISBN编号：7108032260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三联书店

作者：苏力 陈春声主编

页数：6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进入21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文明对于这个时代的人类历史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

这些问题萦绕在许多关心中国与世界文化命运的人的心头。

正是出于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和文化处境的关怀，由周凯旋、董秀玉两位女士发起，我们于2004年成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女士与董秀玉女士任论坛理事会理事长，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任理事会理事。

著名学者杜维明、金耀基、李泽厚、王元化、韦钰、许倬云、杨振宁等先生应邀担任论坛顾问。

论坛经过反复讨论确立了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即立足于21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我们也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来界定所谓“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这个“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抽象的文化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

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内容概要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目共睹。这三十年也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学术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三十年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既面临本身的发展、传承乃至世代更替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构建的一个部分。本书从思想塑造的维度，细致深入地总结、反思、批评包括学者自我在内的三十年中国思想学术，在学术世代更替的历史感中，凝聚当代中国的学术共识，增强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当代中国学术具有创造性的坚实发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书籍目录

导言 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第一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由来 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

——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问题与评论（一）第二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二）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法学职业知识和社会科学——侧重当代中国三十年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 法律经济学在中国 问题与评论（二）第三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三） 中美两国可以避免战略摊牌 关于三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一项批评性和建设性兼具的讨论 30年，60年：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问题与评论（三）第四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四） “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中国模式 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建：“双向运动”的视角 问题与评论（四）第五场 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思想创造的困境（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再论“中间圈”——“藏彝走廊”的论述与“社会”科学的再构思说明 失衡螺旋与国际形象 问题与评论（五） 第六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一）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谁在中国发现什么历史？

——中西史学界的对话与自说自话 纠葛于若干对立概念之间的中国历史学 问题与评论（六）第七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二） 远去的文学时代（提纲） 市场社会的样板人——近三十年大众文化推出的人格类型 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 问题与评论（七）第八场 人文学科与时代精神的演变（三） 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1978-2007） “理论”的实践意义——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发展的两点反思 从社会的热潮到深层的问题——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来的反思 问题与评论（八）第九场 教学与研究体制的影响 留学运动三十年后（提纲） 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 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知识的生产与流通 文教改革三十年：何去何从 问题与评论（九）第十场 圆桌讨论 学术传承与世代更替 学术世代交替是大道自然的过程——中国文化论坛2008年会总结陈词 问题与评论（十）

章节摘录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三十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

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

可以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

然而，回首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中国奇迹形成的原因。

文章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和评价目前流行的几种观点，并讨论华盛顿共识和中国奇迹的关系；第二部分提出文章的主要观点，将阐述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以中性政府对这个角色进行概括；第三部分论述中国中性政府的政治基础，指出合法性挑战和地方分权对形成并维持中性政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论述中国中性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附带讨论这个平等结构的由来；第五部分讨论三十年高速增长所积攒下来的问题，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一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 对中国高速增长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

且不说这种解释有文化沙文主义之嫌，仅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而化之的偷懒之作。

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增长的另一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

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

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

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全世界2007年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

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人不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

因此，从长期福利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时代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负帕累托过程。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工农业生产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只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农业才又开始出现明显的问题。

本文的关注点不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法展开对它的讨论，只是想强调，计划经济的失败——如果是失败的话——更多的不是经济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和社会的失败，即人民自由思考和自由选择权利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的破坏。

对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

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秦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解释的问题很多。

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

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以忍受饥寒交迫的生活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首先要解决的人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问题。

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

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因此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

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权的结果，因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因此收入差距在拉大。

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进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

当然，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可能是因为农业的收益率太低，农村的生活质量太差。

但这恰恰说明新农村建设是必要的，而奇怪的是，我们许多知识精英们却反对新农村建设，要么声称这是对资源的浪费，要么声称这是想把农村居民束缚在农村。

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3年到5年大大降低了，而农业收益率和农村生活质量提高之后，农村居民就更可能体面地出外打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他们的人权就更可能得到提高。

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

我们知道，人世是促成中国出口发生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

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7000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

我们的出口的确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是世界的组装工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别人剥削了。

回想19世纪的英国，也曾经是“世界工厂”，但中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认为英国当时被世界剥削了，相反，我们过去还认为英国是利用它的“世界工厂”地位销售廉价品来剥削世界，正如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人认为中国正在做的一样。

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出口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的确，中国工人的福利保障还很低，在很多工厂和厂矿，工人的安全还得不到保障，一些工厂还在雇用童工；另外，许多工厂还在没有节制地采用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技术，贻害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子孙后代。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

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约12%享受医疗保险。

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

同样的，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理由。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

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女人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一样。

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

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对于那些明显地违反法律的事情，如雇用童工、降低安全标准、违反《劳动法》、超标排放等行为，我们要坚决制止并予以处罚，但如何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方向性问题，后者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过于统一的标准非但不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会伤害他们。

比如，要求农村移民工人享受和城市工人同样的养老标准就不会帮助农村移民工人，因为他们经常流动，而现在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机制，保证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养老保险带走，结果，他们和企业的缴费补贴了城市工人。

再比如，如果要求所有人购买同样高标准的医疗保险，则许多人会选择购买，从而被排除在医疗保险之外，好的初衷却成就了相反的事情。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